



* 修订全译本 *

中国之欧洲

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下卷]

L'EUROPE CHINOISE

[法] 艾田蒲(René Etiemble) 著

许 钧 钱林森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文库

汉学名著

* 修订全译本 *

中国之欧洲

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下卷]

L'EUROPE CHINOISE

[法] 艾田蒲(René Etiemble) 著

许 钧 钱林森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上卷根据 Gallimard 出版社 1988 年版,下卷根据 Gallimard 出版社
1989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欧洲(上下)/(法)艾田蒲(Etiemble, R.)著;许钧,钱林森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
(学术文库·汉学名著)
ISBN 978-7-5633-7469-4

I. 中… II. ①艾…②许…③钱…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78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46 字数:650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78.0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上卷概要——代题铭

关于耶稣会传教团,狄德罗确有清醒的认识。

“他:[……]外国神祇谦恭地在当地的偶像旁就座;他渐渐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天,他用肘猛推同座;咣嗒一声,偶像滚落在地。人们说耶稣会士就是这样让基督教在中国和印度立住了脚跟。不管冉森派教徒怎么议论,在我看来,这种悄然无声,不流血,不伤人,也不揪一绺头发而达到自己目的的策略是最好的。——我:您方才所说的一切,差不多是有道理的。”

狄德罗著《拉摩的侄子》

R. 德斯纳诠释

J. 瓦尔洛和 M. 罗伦斯序

巴黎, 社会出版社, 1972 年, 第 166 页

前 言

无论是偶尔翻阅还是出于需要,凡想通过本卷接触我的《中国之欧洲》的读者,请参阅我推出上卷时所写的那段话:倘若想要像约瑟·尼达姆^①编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②那部伟大著作那样进行研究,那至少需要有一个研究班子,用10年时间才能把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作个全面的总结,这恐怕要追溯到希腊文明年代,当时是通过丝绸之路,还要追溯到罗马文明年代,罗马的商船曾在太平洋海岸停泊,以获取中国丝绸。简言之,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试图指明在中国的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欧洲带来的一切,诸如中国的技术、思想和艺术等,那是因为我想促动一下我梦想成立的那个研究班子,希望他们能超越我的研究水平。这里,我试图说明的,只是在18世纪,尽管人们酷爱中国的工艺品,而且还发现了中国的音乐、戏剧和有关中国科学的某些方面的情况,但并未能挡住欧洲的变化,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欧洲对中国的仰慕到对中国的排斥这一变化,由于某些“启蒙”哲学家的作用,对中国的排斥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在这些先驱之后,紧随而上的是炮舰,在英国成功地把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一艘艘炮舰无耻地轰击帝国,

① 即李约瑟。——译注

② 一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注



把她沦为殖民地,欧洲实在忘恩负义,因为正是这个帝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丰富着欧洲的思想、科学和艺术。人们自会明白,我之所以坚持己见,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一中国之欧洲的某些侧面进行研究,原因正在于此。尽管我了解在18世纪传给欧洲人的那部伟大的中国植物志《本草纲目》的历史,尽管我也拜读过E. 罗沙·德·拉瓦莱(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有关这一问题的精彩报告^①,但我并不准备在此重新叙述它的来龙去脉!倘若我有心就想欧洲各国的情况,按国别发表类似俄国人在1969版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在上卷的序中已经提及,俄国人发表了两大卷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与文件),那至少需要10卷的篇幅,需要付出20余年的心血。仅就英国而言,自我发现丹尼尔·笛福的断言之后所进行的调查,以及其他如欧文·奥尔德里奇(Owen Aldrige)的调查成果,哪怕再简缩,也可轻而易举地写上30来页。笛福曾断言,若将中国与他的国家和国民作一比较,那中国便会自我暴露,给人以极不光彩的形象,中国人程受颐(Ch'en shou-yi)于1935年在天津发表了《丹尼尔·笛福——对中国的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公开了这一所谓的形象。在这之后,我还看过不少有关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献给英国人的精神礼物和其他赠品的文章。关于儒家在18世纪的英国的情况,我自然在《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读过埃德蒙·利茨(Edmund Leites)的那篇论文^②。

我也没有忽视欧文·奥尔德里奇的论文,他是关心远东与欧洲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比较文化专家中的一位,他的那篇题为《启蒙时代的英国文学中对中国的看法》的论文见于1986年问世的《世界文学的重现:亚洲与西方之研究》^③。我们怎会忘记John T. 普拉特(John T. Pratt)在《中国与不列颠》一书中明智地承认中国所赠予欧洲的一切,比如茶,那是在17世纪初由荷兰商人介绍给欧洲人的。普拉特毫不犹豫地写道,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有负于那个如此遥远的国度。对一个英国人来说,没有茶的日子,该是多么“烦闷”(在那部英语著作中,用的是法语的“ennui”一词)啊!普拉特也没有忘记在17、18世纪“流

① 见《中国植物志(本草纲目)在18世纪流传欧洲的始末》,载《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88),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8年,第177—194页。

② 《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0年,第65—81页。

③ 此研究文集的单行本得益于他,他的文章的页码为1—25页。亚太议员联盟亚太文化中心出版,第14卷第2号,1986年。

入欧洲的那些数量不断增加的”中国手工艺品,诸如瓷器、漆器、玉器及景泰蓝等。他同样也知道中国从来没有厚颜无耻地把人类看作“宇宙的最终目的”,并为之而感到庆幸;他也许也有失误之处,如他曾自问为何“她(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会如此之小”,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与此较为矛盾的看法,他承认一种“对来自中国的东西——包括哲学——的狂爱之潮席卷了欧洲,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a craze for Chinese things—including philosophy—swept Europe, and particularly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后来,这致使普拉特为皮勒芒特(Pillement)于1770年出版的《中国茅屋》大声叫好。他还有别的失误,那就是他认为这一狂爱中国工艺品的欧洲对孔子却似知非知;然而在1691年,就在伦敦出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伦理学》,实际上,这部书不过是三年前在阿姆斯特丹问世的那部法文名叫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的著作的转译本。此外,埃德蒙·利茨也分别以英法文发表过《在18世纪的英国的儒家:自然伦理与社会改革》一文^①。

1977年的那届研讨会特别提供了一份在美国完成的有关中国在启蒙时代的作用的研究成果录,同时还提供了一份题为《启蒙时代对中国的理解: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成果。尽管我对沃尔特·沃森(Walter Watson)的报告并不完全赞同,但不管谁接触类似的研究,这一题目是绝对成立的。证据之一就是30年前,我在巴黎索邦大学执教的初期就涉及过这一题目。在此书的上卷中,我说明了中国何以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精神上吸引了欧洲,而在本卷中,我则要扼要地叙述欧洲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构成了这一具有双重价值的中国的两个支柱。其中,我还要尽可能谈一谈“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戏剧中的演变情况。倘若人们认为智慧之光的传播总是由东向西进行,并认为“光自东方来”(ex oriente lux)这一格言总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对思想的传播史就有可能完全不了解了。如果说中国人给予了我们许多的话,那他们至少也接受了一些东西。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在欧洲介绍了中国,倒不如说是把西方介绍给了中国人;但是,若我们抹杀了他们为介绍中国思想所作的贡献,那就大错特错了。韦拉朗先生(M. Verhaeren)给北京的那些耶稣会士一点一点搜

① 《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法文本见第51—64页,英文本见第65—81页。英文本中有一些注释,但在法文本中则没有。



集而来的图书精心编写了一份目录,并且公开出版,耶稣会的雷迪夫神甫(P. Rétif)在一部名叫《在中国的一座复兴书馆》^①的著作中对韦拉朗先生所编的图书目录的价值作了评价。

这一“北堂书馆”拥有耶稣会士们认为对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很有用处的各种欧洲图书:“它在两个互不了解的世界之间起到了联结线的作用:对远东而言,它为传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出了贡献;而对西方来说,它则为介绍远东的人文财富给予了间接的帮助^②。”

圣方济各·沙勿略本人对这座藏书馆的图书是有选择的,他曾在远东给上司写信:“我希望这些教友不要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切勿把不具备渊博学识的神甫派往日本或中国。”后来,利玛窦坚持按他前任的意图行事,有幸实现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计划。他每次给欧洲写信,要求给他的书馆提供图书,给予帮助时,他总是再三强调,要求得到类别尽可能丰富繁多的图书。“他因此而想完善自己的知识,引起与他过从甚密的中国文人的钦佩与好奇^③。”在他看来,好奇与钦佩是人间可把不信教之人引往上帝的众多道路中的两条。在现存的《北堂书馆图书目录》中,还可查到当初建馆时第一批藏书中的几部图书,书馆建于1605年,据某些学者,确切的日期为1605年8月27日。常来拜访利玛窦神甫的中国文人确实对这座藏书馆惊叹不已,里面藏有西方有关天文学、几何学和钟表制作术的论著,也有宗教、哲学、伦理和历史书籍。利玛窦死后,龙华民神甫虽然在某些方面否认了他的前任的学说(尤其在有关中国某些玄学概念的含义方面),但有关北堂藏书馆的事业却是继承了下来。正是为了这一事业(但并非仅仅为此事业),他把金尼阁派回法国,后来,金尼阁通过海路把近七千册西方图书运到了澳门,继而又通过水路运送这批图书。在几个世纪中,这座藏书馆历尽了劫难。1644年,满族人灭了明朝,火烧北京,然而大火中耶稣会士们的藏书却丝毫未损,雷迪夫神甫高兴地称之为“几乎是奇迹”。可是1812年那场大火,他却不敢再称为“奇迹”了,东堂的藏书馆在大火中损失惨重,当时,东堂是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第二个传教要地的常驻点。在

① 请参见《北堂书馆图书目录》,北京,遣使会会士印刷社,1944—1949年,有关这一专题,请参阅J. 代尔涅的文章,载《震旦大学学报》,上海,1949年期,第262页。

② 见雷迪夫一书,第113页。

③ 见雷迪夫一书,第114页。

19世纪,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耶稣会士们曾一度把藏书馆残存的图书委托给俄国的东正教传教团保管;32年后,即在1860年才重新收回。1862年,蒂埃里(M. Thierry)编写了一个手抄目录,全部藏书共计5,930册。现存5,133册。在17世纪,一座拥有七八千册图书的藏书馆,我们假设是由各类图书组成的,那它足以使人们对欧洲的思想、宗教和科学有个概要的认识。由于我在上文刚刚提及的那些事变的缘故,我们无法一一弄清中国人在耶稣会士们那里有可能发现的一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个近似的了解。在书目中,没有列入培根、伯麦(Jakob Boehme)、布鲁诺(Giordano Bruno)、霍布斯(Hobbes)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的作品,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无论是实证思想,异端的神秘主义,还是当时要受到焚烧制裁的严格的理性思想,都无助于实现耶稣会士的目的。因此,你也别指望在书目中看到路德和加尔文的书。但是,《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①却使蒙田得以进入中国:在北堂藏书馆里,可以读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先驱库萨·德·尼古拉斯(Nicolas de Cuse),哲人、名医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e),卡尔达诺(Jerome Cardano, 1501—1576)、勇敢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乔凡尼(Giovanni Pic de La Mirandole, 1463—1494),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以及其他学者的书籍,如克莱芒八世的医生切萨皮诺(André Césalpin)、鲁汶公教大学教授利普修斯(Justue Lipsius, 1547—1606)、素以言辞尖刻闻名的瓦拉(Laurant Valla, 1407—1459)和皮埃尔·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等”。伊拉斯谟的大名也列在书目上,上面还列有勒菲弗尔·戴塔普尔(Lefèvre d'Etaples)的名字。雷迪夫神甫还告诉我们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的有关图书在这座藏书馆里全都经过“评注与校改”。这是自然的事。此外,耶稣会士的护教论主要是建立在博学者和能工巧匠的成就之上,而不是以哲学家为基础。在天文、数学、医学、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藏书馆给中国人提供的几乎是当时的西方世界所创造的一切最优秀的成果;凡是与航行、建桥、地球仪、自动木偶以及风车制作有关的书籍,他们无不热烈欢迎;甚至对有关介绍电力基础知识的书籍,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一切无不给神甫们提供帮助,A、M、D、G^②。

人们也许希望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我相信若在中国进行认真的研究,那定

① 此为蒙田《随笔集》中的一章,抨击了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译注

② 拉丁文,意为“为了上帝的更大荣耀”。——译注



将有助于发现这一藏书馆所起的作用：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中国的科学与思想的发展方向。目前，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我们仅仅知道穆斯林和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对这门迫使他们修改历法，并因此而改变世界时序的外国科学，并不是痛痛快快就接受的。为了战胜非基督教徒，在北京的那些耶稣会士们给伽利略写信，在许诺保守秘密的同时，请伽利略为他们计算某部中国书籍中提及的某次日食的时间，想想这种做法，确实有趣。那些完全同意教廷以真理的名义对学者伽利略作出判决的人们，竟然采取这种做法，真是真理的莫大胜利！要是我依据的材料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是在1612年了解到了伽利略的学说；1614年，马尼埃尔·迪亚兹神甫(P. Manuel Diaz)在他对天体的解释中巧妙地提到了伽利略的学说；同年，耶稣会会长发布禁令，严禁会士们传播伽利略有关天体之本质的思想。神甫们因此而左右为难！为了征服中国，让中国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不得不向中国人介绍比穆斯林天文学更胜一筹的天文科学，可会长却禁止他们使用这一最为有效的武器。我们都读过《修会省会长嬷嬷》，不难猜想耶稣会士们是以何种巧妙的手段摆脱困境的：在北京观象台，他们利用了迪亚兹神甫的论著和伽利略的发现；然而他们在公开场合传播的则是托勒密体系^①。差不多到了1865年，天主教传教士们才向中国人宣布了开普勒(Kepler)和伽利略的观点：当时，我们的炮舰正在向中国人揭示我们文化的另一个侧面。中国的有识之士适时开始了改造中国的事业，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版了利玛窦神甫亲笔译成汉语，并于1607年出版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篇)。我很高兴地看到当今中国有着对技术的酷爱，这是利玛窦神甫和他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取得的唯一的胜利。请看西方的捍卫者之一康有为在过去并不久的年代所说的一段话：“外部世界业已彻底改变。我们务必往外看，尔后据我们所见改造内部。中国目前之无能源自其一贯的闭关锁国，这先后持续了数世纪之久。民族正在因窒息而死去。砸碎我们的锁链！给我们空气！……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和汤若望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幅世界地图，给我们解释了星球的运行，修定了我们的历史，为了赢得小人物的同情而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些善事。”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这一个个全是耶稣会士！

^① 描述太阳、月球和行星位置及视运动的一种宇宙理论模型，为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托勒密于公元140年前后所提出。——译注

仅凭北京的那家藏书馆,恐怕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因为懂法语或拉丁语的人为数寥寥。但是,耶稣会士在创建这家藏书馆的同时,用汉语翻译、出版了许许多多的科学著作,并在这些译本的基础之上,自己动手用汉语编撰原本。早在17世纪,基歇尔神甫就立了第一份书目,列入的就是我们的那些神甫们为扩大中国教堂的势力而编撰的书籍(见基歇尔那部有关中国的书的第158页和后面几页)。亨利·科尔迪埃(Henri Cordier)那篇介绍《17、18世纪欧洲人在中国发表的著作目录》的文章见于由勒鲁出版社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东方文集》的第495—546页。此外,还可参阅下面这一书目:《自沙勿略逝世后至1872年在中国致力于福音传播的耶稣会神甫与会士著作目录》^①,此书目于1873年由A. H. 德·卡瓦勒霍(A. H. de Carvalho)在上海出版。科尔迪埃编写的书目虽然远远谈不上齐全,但欧洲人在我们关心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发表的著作已被列入二百种之多。

自科尔迪埃的书目之后,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有:《1513—1638年间改译成汉语的欧洲著作》,见《中国资料集》(1945,第1—57页,第309—388页),并附有书目,见14—15页;A. M. 科隆贝尔(A. M. Colombel)神理学博士所著的《江南传教史》,石印(上海版,卷一,第567—587页);亨利·贝尔纳(大师)所著的《第一个名士院与中国》,见《马可·波罗传》(卷二,上海No. 3,第21—34页)。全部书籍远不止200种,据有关学者,耶稣会士在中国发表的著作达300种,甚至有人说多达363种。我们怎能指望全都了解个一清二楚呢?这些著作中有许多都是以汉语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教条。因此,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凡事都以孔子发誓之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有的甚至还是孔子的门徒,却抛弃了孔子,投到耶稣—基督教的门下。传说耶稣会的毕方际神甫(P. Sambiasi)用汉语发表了《灵言蠡勺》一书,可汉语中没有与天主教关于“Âme”(灵魂)这一概念完全对应的词,神甫无奈,只得用ya ni ma三字来传译âme一词,然而所谓的ya ni ma三字,只不过是拉丁文,“anima”一词的近似音译。后来,一位王子读到了《灵言蠡勺》,当他读到那位耶稣会士用以传译“âme”一词的“ya ni ma”三个音译的所谓汉字时,突然受到神启,惊叹不

①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e Societate Jesu qui a morte S. Fr. Xavierii ad annum MD-CCCLXXII Evangelio X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 Pars Prima*, Shanghai Typis, A. H. de Carvalho, 1873.



已,竟把连他这个中国人都绝对看不明白的纯粹拼凑而成的三个字当作灵魂存在的证据。于是,这位名叫 Sang kong-ye(尚孔易)的王子皈依了天主教。这确实是“智慧之光的传播”相当有趣的效应;这位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灵魂”的理解自然不比马勒伯朗士对“理”与“气”的理解强多少。

实际上,尽管康熙在17世纪末发布了宽容的圣旨,允许中国人自由信仰基督教,同时给了传教士们自由传播福音的权利,但是,天主教在中国并无多大发展。在中国,耶稣会士们往往是以科学与技术专家的面目出现的,说到底,他们也确实科学和技术专家。为了使新门徒们对天主教怀有好感,耶稣会士们毫不犹豫地,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汉译本上印上基督的字样;他们精明地打着小算盘,既然中国人被几何学那不可否认的真理所吸引,那他们也许会认为宗教之真理也同样是不可置疑的,因为这同一批耶稣会士向他们保证两者都是可信的。耶稣会就这样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数学、宇宙志、解剖学和技术书籍。除了宗教书籍之外,利玛窦神甫还发表了《几何原本》(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见国家图书馆,法国标准汉语藏书号2959—2960);后来又出版了《同文算指》(国家图书馆,法国标准汉语藏书号3304);熊三拔神甫丝毫不怕有失身份,用汉语写了《泰西水法》(国家图书馆,法国标准汉语藏书号3209),金尼阁神甫编写了对数的书籍,邓玉涵神甫(P. Terenz)编撰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论人体的著作。另有一位耶稣会士编撰了《职方外纪》和《西学凡》两部书,并因此而成名。这就是艾儒略神甫(P. Giulio Aleni),他除了编写这两部书之外,还撰写了近二十部护教论著作,其中有一部教理书,一部论弥撒的书,一部论忏悔的书,还有几篇对话录,写的是作者与一位中国人有关基督教的对话,该书于1847年重印。(拉莫特·勒瓦耶将孔子称为东方的苏格拉底,而据说中国人则以艾儒略神甫为殊荣,称他为“西方的孔子”。这种相互的称呼意义重大。)我们千万别忘了南怀仁神甫,尤其别忘了汤若望神甫,他们这两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在中国的官廷为法国和欧洲争得了多少荣誉!南怀仁神甫在北京用拉丁文主编了多部天文学著作,还用汉语编写了一部《宇宙志》和一部论温度计用途的书。至于汤若望神甫,他在中国发表的著作大多是有有关数学和天文学的。他用汉语编撰了《远镜说》一书,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基督的叛逆。汤若望神甫的《天文百科全书》在中国历法的改革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对这部百科全书,贝尔纳—梅特神甫(P. Bernard-Maitre)作过精彩的

研究,详见《中国资料集》(卷三,1938,第1、2分册)。耶稣会士在中国地图绘制技术的创建方面也起过作用,就此可以说的自然也很多^①。1655年,《中国新地图集》在维也纳出版,这对利玛窦和金尼阁神甫来说是个胜利。此后不久,巴多明神甫(P. Parrenin)着手《中华帝国与鞑靼地区图集》的绘制工作。康熙皇帝下令由雅尔图神甫(P. Jartoux)对中国各地区的地图进行了统一的修订。正是从那时起,清政府对俄国在远东的野心感到不安;后来导致了战争,最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8),了结了战事。康熙于是特别注意了解有争议地区的情况以及边界的界定问题,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了。对处于中国与黑海之间地区的情况,康熙皇帝不向西方的耶稣会士讨教,还能向谁讨教呢?1727年,在俄国大使的来访期间,康熙的第13个儿子(在他兄弟雍正的朝中做大臣)召见了戈比尔(Gaubil)、德·马亚(de Mailla)、巴多明和徐日升(Pereyra)等神甫,请他们绘制一幅黑龙江、北冰洋和东海之间区域的地图和一幅包括西伯利亚、俄罗斯和圣彼得堡地区的地图。次年,根据皇上的命令,戈比尔神甫又绘制了一幅“与俄罗斯、土耳其、波斯和鞑靼接壤省份”的地图。所有这些情况,我是在贝尔纳-梅特尔神甫的文章中获得的^②,贝尔纳-梅特尔神甫就此还这样说过:“令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欧洲对远东的情况如此了解。”

在中国思想付出了被部分曲解的代价,但有力地影响着欧洲的时候,基督教对清廷的知识阶层的影响却微乎其微。雅克·谢和耐那部名叫《中国基督教:行动与反应》^③的重要著作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在上卷的结语中援引过他的这部著作。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都已经清楚,伯希和(Pelliot)在《“安菲特里特”在中国的首次旅行》中写的那段话富有见地:“默契实际上是个误会;康熙对传教士们态度友善,因为他想得到他们的科学知识,从中获益;传教士们充当学者,则是为了获得一种权利,使他们得以发展传教事业;这对一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另一方来说则是次要的。”

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持有这种观点,我向来认为所谓“智慧之光的传播”往

①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马塞尔·戴斯顿伯(Marcel Destombes)的文章:《王潘(译音)、梁寿(译音)和利玛窦:论1593—1703年的中国地图绘制术》,载《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第46—62页。

② 《中国与邻国的地图绘制科学自16世纪至18世纪末的各个发展阶段》,见《中国资料集》卷一,第2分册,第428—477页

③ 伽利玛出版社,“历史文库”丛书,1982年。



往是建立在相互的误解之上:无论是欧洲在中国的影响,还是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定调子的往往是我在上文提及的“ya ni ma”之类的趣事。

我在《中国之欧洲》上卷的结语中提到,我们的培尔完全可以这样写: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存在着。存在于何处?当然在中国啰!传教士们已经向我们作了相当清楚的证明!

那就让我们等待着下文吧……

下文在此。这紧接着的下文令人相当困惑:莱布尼茨把那个帝国当作令人鼓舞、举世称颂的道德标准模式,然而,离开莱布尼茨,一接触孟德斯鸠,我们便从天上落到地下。我们接触的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孟德斯鸠,即于1748年在日内瓦发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孟德斯鸠。一切都在动摇,从我们的这位德·拉布雷德男爵开始,出现了一定形式上对中国的排斥,在18世纪中期,这种排斥之风还成不了什么气候,但后来力量渐渐壮大,一直影响到了马嘎尔尼使馆,最后发展到了对这个帝国的谴责。然而,在耶稣会传教士们看来,这个国家富有美德,完全可以成为某种楷模,而且在不少方面,可以成为人类的楷模。对一个不满足于像别人那样只读一读《论法的精神》就了事,而是试图从他们一些私人书信集中寻找资料的人来说,对中国的谴责就显得让人非常诧异了,因为在他们某些私人书信中,我们发现中国并非骇人的怪物;相反,这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值得称颂的帝国。对这种既非两面手法,又不是针对书刊检查而采取的谨慎措施的做法,该如何解释呢?

这很简单。只需提一下富凯(Foucquet^①)的名字就可解释清楚。富凯本是耶稣会士,由于他极力反对其他会士的做法,反对他们引导欧洲欣赏中华帝国的美德和这个帝国所树立的榜样,于是被逐出教会。当然,这个人物现在早已被人忘却。即使去查阅《拉鲁斯大百科全书》及其补编部分,也不可能见到他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很公道的事:自富凯被迫退隐到罗马之后,有不少人碰见过他,其中包括智慧而又尖刻的德·布罗斯院长(De Brosses),他在孟德斯鸠与富凯见面的十年后,即于1739年见到了那个“出生于韦兹莱^②的勃艮第人,此人原是耶稣会的要人,做过耶稣会传教士和埃莱布塞鲁波利斯

① 华名为傅圣铎。——译注

② 法国约讷省的一个村庄。该村的历史与建于9世纪的本笃会隐修院密切相关。——译注

主教,现退隐在教廷的传信部”。这基本上概括了富凯一生的命运,他轻而易举地影响了孟德斯鸠,并善于把一个在私人信件中处处表现出对中国仰慕之情的人造就成世上第一个排斥中国之徒,而此人在整个18世纪,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华帝国的印象。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事情很简单:德·布洛斯为给他的男友们提供情况,并讨好他的那些漂亮的女友,在1739至1740年间,从意大利给他们频频写信,后结集为《友人通信集》,这些书信与那位与教会决裂的传教士的调子恰好一致,而在十年前,亦即在1729年,富凯正是以他的“激情”和“才智”轻易影响了德·拉布雷德男爵。

不过,与富凯多次见面的德·布洛斯院长眼中的中国与孟德斯鸠根据同一位叛逆者所介绍的情况而在自己脑中形成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着矛盾之处,对此,人们加以解释的方式远远不是一致的。

若参阅《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①,可从中读到赫尔曼·哈德(Herman Harder)一篇长达十余页的论文,哈德当时住在巴黎大学国际城,文章的题目为《18世纪中国的“政体问题”:罗马富凯大人府中的孟德斯鸠和德·布洛斯》^②。哈德借用了由罗杰·凯洛瓦(Roger Caillois)在“七星文库”推出的《孟德斯鸠全集》,参考了于1944年首次发表的《杂记》一书,列举了《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在与那位耶稣会士的几次接触中得到的某些情况。不错,富凯确曾给他的对话者解释过,说中国经常发生偷盗和饥荒,稻谷收成不好,难以补偿多子女的中国妇女的需要。他甚至还对孟德斯鸠说皇帝“对一个人的生命就像对待一只苍蝇,根本不在乎”。恐怕孟德斯鸠轻信了那位前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嘲讽之辞,相信了那些至少可以说是夸大事实的议论,那位耶稣会士是因为宣传“旧约象征说”而被从那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此君相当幼稚,或者说相当无知,竟在他的那部《〈五经〉之研究引言》中说天主教教条“在《五经》中也有阐述,有时阐述得跟最令人崇敬的宗教著作一样清楚。”在中国,也许还能隐约地、甚或清楚地看到挪亚、圣母、耶稣的存在,可是中国人遗忘了这些真理,一下子陷入了可怕的迷信和偶像崇拜之中。这个富凯对科学知识的确了解甚少,他于1729年在罗马发表了那份轰动一时的《中国纪年表》,否认在公元5世

① 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8。

② 《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第79—92页。



纪之前与中国相关的任何历史概念。正因为如此,赫尔曼·哈德觉得维吉尔·皮诺确实有理由不承认富凯那个所谓的历史学家头衔,我“甚至”认为,称这个富凯为“脑子不正常的家伙”恐怕也不为过。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因为别人拥有真理或自己拥有真理而感到恼火,为了表现忠诚,我要在此提一提赫尔曼·哈德就这个问题对我的责备:“艾田蒲十分了解18世纪的中国问题,对德·布洛斯也很喜欢,他一直对《友人通信集》的作者大唱赞歌,盛赞他在这桩有关中国的事件中持有极为中肯的看法。

“可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错了:‘出于对耶稣会士的仇恨,同时为了证明自己就《论法的精神》一书形成的观点,孟德斯鸠接受了前耶稣会士富凯的偏见,然而当时最疯狂的人士之一,德·布洛斯院长(原文如此)却丝毫不上给他提供情况的那个人的当。’

“我们都已经看到,应该把德·布洛斯所抛弃的历史的和旧约象征说的观点与他进行的政治分析区别开来,在政治分析方面,他像孟德斯鸠一样,是个排斥中国者,因此也与孟德斯鸠一样,以富凯的话为依据。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致使德·布洛斯显得并不像艾田蒲所认为的那样富有天才,在艾田蒲看来,德·布洛斯‘是1750年之前唯一的一位毫无差错地评论中国的作家’。罗马的那封有关富凯和中国的信并不是写于1740年;实际上,据德·布洛斯自己证实,此信写于1755年,这也就是说跟写《风俗论》的时间差不多,而远在《论法的精神》、《中国孤儿》(原文如此)、《路易十四时代》以及众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发表的时间之后^①。”

尽管孟德斯鸠在与那个“头脑不太正常”的家伙见面的时期,还没有提出有关三类政体的理论,然而,那个脾气恶劣的旧约象征论者所说的情况却影响了他,使他把中华帝国列入了最令人痛恨的独裁制度一类,虽然在此期间,他至少查阅过,恐怕还认真地研读过杜哈德神甫的《中国通志》^②(1735)。孟德斯鸠在杜哈德对中国的仰慕与富凯对中国病态性的排斥之间摇摆不定,因

① 在哈德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又读了德·布洛斯的书,我承认他的头脑虽然对中国比较开放,甚至远远超过其他许多人,但对那个当时引起众多异议的国家并非一味吹捧;我又重读了自己援引过的那封信:“我相当怀疑那个国家能像人们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文明、富有道德,因为在那里存在着绝对的独裁,存在着奴性,这种奴性造成了心灵和精神的堕落,一般来说,伴随而来的将是风俗的恶化。”

② 全名为《中华帝国与中国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年代、政治与自然通志》。

此很难公允地对中国作出评价。德·布洛斯则清楚地看到了富凯说了许多无稽之谈。“我发现在我研究的相关主题上，他总是掺入自己的偏见，跟我谈的与其说是存在的事实，不如说是他的想象：他说什么中国人来自迦勒底，他们的文字起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他们那五本名书是对希伯来《摩西五经》的模仿，尽管这些书除了数字五之外毫无相同之处；类似的话还说了许多，纯粹是藏书癖特有的想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德·布洛斯院长十分智慧，反对任何的独断主义，所以理解了礼仪之争的实质，归还了各自的面目。下面这页文字写得中肯贴切。请我们再重温一下：“那位慈善的皇帝（指清朝康熙皇帝）想方设法让教皇特使（指梅扎巴尔巴枢机主教，他在图尔依之后来到中国，否认耶稣会士的观点，阐述罗马教廷对礼仪，或如德·布洛斯所说，对中国礼仪的看法）明白‘天’字的意义，说明天字并非仅仅指物质的天。教皇特使丝毫不明白。对方于是强调问道：‘您懂汉语吗？您不懂。可我也不懂意大利语。要是我到罗马，就意大利语某个词的意思与教皇争执不休，您对我会有何看法？您难道不会觉得我无理纠缠？你们这些欧洲人，我诚心地接待你们；我给你们种种好处；我让你们传播你们的宗教，这里所有的人对你们都很好，可你们自己却总是跟自己过不去，你们之间总是相互使坏。要让你们之间达成一致，比我统治整个帝国还难。这只会给我造成混乱与烦恼；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不要有什么基督教。’皇帝差不多就是以这番话结束他的讲话的。不知您是否读过有关梅扎巴尔巴教皇特使团的那部书？此书是由特使秘书、圣母玛丽亚会修士维亚尼神甫（P. Viani）在米兰印刷出版的。在我读过的有关书籍中，这部书对耶稣会的抨击最为猛烈。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看似十分简单，收入的却是一些详尽的事实，录有使团的某些材料片段，从不掺入作者的看法，只是在书的结尾，作者才开始表露出对耶稣会的恶意^①。态度公正的人们可清楚地从这部书中看到两点。（请注意德·布洛斯是敢于表现出公正的态度的。）一是耶稣会士们明确而又坚决地拒绝服从罗马教廷的权威；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们对教皇和教皇特使的态度是相当傲慢的，而且还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他们反对教皇谕旨的强硬态度不亚于他们极

^① 见《意大利书信集》（第 XLVII 号信）。